

杜成宪 主编



Zhongguo
Jiaoyu Wenhua
Yanjiu
Congshu

中国教育文化
研究丛书

中国大学教授研究

——近代教授、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史

(1895-1949)

陈媛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杜成宪 主编



研究丛书

化

中国大学教授研究

——近代教授、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史

(1895-1949)

陈媛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大学教授研究/陈媛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2. 9
(中国教育文化研究丛书/杜成宪主编)
ISBN 978-7-5440-5616-8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教授-研究-中国 IV. ①G64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2980 号

中国大学教授研究——近代教授、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史 (1895 - 1949)

ZHONG GUO DA XUE JIAO SHOU YAN JIU JIN DAI JIAO SHOU DA XUE YU SHE HUI DE HU DONG SHI

责任编辑 郭志强
复 审 杨 文
终 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9. 7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5616-8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1-4120948

总 序

20 世纪初，适应了兴办新式学堂的需要，也深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诞生。教育史学科诞生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学科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人才培养，即为师范学堂（学校）培养未来的教师进行专业训练。之后，出于思考和探索现实中国教育发展出路的需要，人们开始主动地反思本国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教育史学科的科学价值逐渐体现并为人们所重视。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早期的这两个特点——教师训练的需要和思考中国教育出路的需要，深刻地影响了学科未来的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在宏观层面注重对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和阐述，成为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主旋律。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上述中国教育史研究取向的第一次冲击，来自当时不同的教育史观指导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以陈东原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教育史观，将目光投向历史事实，注重实证，更关心“教育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之类问题，反对脱离事实的玄想和思辨；以黄炎培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史观，依据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的观点审视教育的历史，主张“用全社会的眼光来看教育、

讲教育”，先将教育的“大史”写成，才能去撰写教育的“小史”；以杨贤江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史观，批判以往教育历史书写中的统治阶级立场，立志以阶级斗争的线索重写教育史，并体现劳动群众的教育活动在教育史中的重要地位。这些史观在政治立场和学术旨趣上相去甚远，但共同点是试图突破反映制度化教育发展和著名教育家思想的教育史表现样式，倡导更为丰富、具体、生动、视线下移的教育史。显然，这种研究理念对固有研究模式是个突破，具有积极意义，事实上也共同促成了当时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繁荣。当然，这些主张及其指导下的研究实践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泛化教育史研究对象、过分强调教育历史发展中阶级斗争的意义，等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面临着与半个世纪前颇为类似的情形，所不同的是，在学科建设和研究中开始普遍地强调和推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同样是更为关注制度化的教育和教育思想。

1958年9月，《红旗》杂志发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观点，认为：劳动人民有自己的文化教育活动，如果不予表现，这样的教育史就不全面；从孔子到孙中山，历史上那些有民主性、进步性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都影响到对人民的教育，中国教育史都要提到他们。于是，在当时所编著的为数不多的中国教育史著述中，劳动人民的生产教育、科技教育等内容

和屈原、司马迁、范缜、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历史人物的思想，也被写进了中国教育史。这样的做法既关注了向来受到忽视的劳动人民的教育、科技教育和非教育人物的教育历史价值，也表现出研究视角的下移有可肯定之处，但其指导思想却颇可商榷，同时也有泛化研究对象、模糊学科界限、造成思想混乱之弊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拨乱反正是从重新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开始的，由此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之前年代教育史研究中诸多教育历史人物和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评价。同时，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迫切需要相应的课程和教材，历史似乎又一次重演。于是我们看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教育史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学校历史、教育制度变革、教育家思想这类研究主题，学术关注的层面仍旧是“高高在上”的。然而，变化也随之发生。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热”，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探索热”，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史学科。前者，启发人们拓宽学术研究视野，去发现和开拓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之外的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后者，引导人们去关注、学习乃至借鉴、运用当代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理论、方法及其最新成果。于是，在世纪之交，作为对以宏观研究为特征、以制度化教育为对象的研究取向的不满，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再次出现视角下移的新趋势，并在近年蔚成风气，成为学术潮流。

出现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史学术发展中的这一潮流，表现出

与欧美国家产生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社会史”潮流颇为相似的学术特点，即：从历史认识论方面看，表现出对“总体的、社会的历史”的关注，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历史进行文化和心态的考察；从方法论方面看，表现出“自下向上看的历史”的价值取向，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视角，普通人和底层群体、日常生活和具体过程等格外地受到关注；从方法与技术方面看，表现出对诸多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借鉴。由此，极大地拓展了教育史研究的范围、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改变了教育史研究的面貌，前所未有地展现了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丰富而生动的画面。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以来的 110 年里，学术研究关注点的三次下移，折射出的却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矛盾运动。每一次下移，都带来了对学科认识的扩展和深化；每一次下移，也带来了学科发展的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表面上看，三次下移具有相似性，而实际上，无论是从背景、原因，还是从性质、内涵和意义等方面进行考察，三次视角下移，情形各不相同，而以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一次最可肯定。这一次的探索更多地具有学术价值，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将会产生长远影响。

本丛书所收入的五种中国教育史著作，可以看成是世纪之交中国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中“新社会史”取向的尝试，它们所关注和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教育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五种著作，分别研究了中国传统童谣、中国传统游戏、中国传统尊师风俗、中国大学教授和中国学校校训。童谣、游戏、风俗、教授、校训，这些问题

在以往的教育史研究中涉及不多，甚至有些还是研究空白。选择这些研究主题并不是出于猎奇之心，也不是好走旁门左道，而是表达了我们对教育历史的理解。作一个不十分恰当的类比：如果将一部中国教育史比成一头巨大的恐龙的话，那么，以往百年里人们更多关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家教育思想的历史研究，搭建起了恐龙的骨架，而近些年来人们关注历史上教育的具体发生和实施过程的研究，则填补了恐龙的血肉，由此恐龙才可能复活。

20世纪90年代，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对教育史的认识，我曾经撰写过从儿童歌谣、儿童游戏和儿童题材绘画探究中国传统儿童观和教育观的论文，也曾撰写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发展与教育发展关系的论文。相比之下，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五本书，比起本人当年的那些撰述，选题更加精彩了，内涵更加丰富了，认识也更加深刻了。显然，年青一代的学者正在成长起来。

我们由衷地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决策者支持学术出版的眼光和胸怀；由衷地感谢张荫鸿老师以她的慧眼选择了我们。这套丛书是我们的探索和尝试，新则新矣，却一定颇多不当、不周之处，如能得到方家同好赐教，将不胜欣喜和感谢！

杜成宪

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contents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社会变革：教授群体形成之缘	13
第一节 西学东渐催生中国近代大学	13
一、中国近代大学的产生	14
二、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16
三、西式大学文化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17
第二节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的两个来源	19
一、科举废除后士人身份的转换	20
二、留学生回国后的职业选择	24
第三节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形成的三个时期	29
一、萌发期	29
二、成长期	31
三、稳定期	36
第二章 聘任机制：教授群体准入之规	42
第一节 政府聘任制度的建立	42

一、清末聘任教习的规定	42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聘任制度	44
三、南京政府时期的聘任制度	47
第二节 大学聘任制度的实施	52
一、大学出台的聘任细则	52
二、大学聘任教授类型	65
三、大学聘任实践面临的共性问题	83
第三节 聘任制度是教授职业的准入机制	103
一、聘任制赋予教授群体专业化	103
二、聘任制赋予教授群体高地位	108
三、聘任制赋予教授群体竞争性	111
第三章 结构审视：教授群体存在之态	114
第一节 要素结构	114
一、国籍结构	114
二、地域结构	123

三、籍贯结构	130
四、学科结构	139
五、性别结构	148
第二节 能级结构	155
一、等级结构	155
二、类型结构	160
三、人格结构	167
第三节 个性结构	170
一、引领风潮的教授群落	170
二、学术本位的教授群落	177
三、注重实用的教授群落	185
四、中西荟萃的教授群落	188
第四章 多重角色：教授群体作用之本	194
第一节 学术角色	194
一、讲课的学问家	195

二、现代学术的开拓者	201
三、学术发展的规划者	209
第二节 社会角色	214
一、中产阶级	214
二、精神贵族	219
三、道德示范者	227
第三节 政治角色	235
一、议政者	236
二、参政者	240
三、避政者	245
结语	251
附录一：新中国建立前夕高等院校一览表	264
附录二：几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名单（部分）	266
参考文献	283
后记	302

导 言

在当今社会，提起大学教授是什么人，大家似乎都不陌生。教授（professor），原意简单明了，即教授是大学教师的职称之一，表示的是一些人为了谋生而从事的一种社会职业。然而，从学术的观点看，对大学教授群体及其角色的这种认识未免过于简单和表面化。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大学教授群体也是如此。自近代中国大学建立以来，中国大学教授也就应运而生了。虽然我们对近代很多著名大学及其中著名教授的历史贡献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对于大学教授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的形成与演变、结构特点以及他们的身份角色和社会作用等复杂问题的认识却往往还比较模糊，或不求甚解。直到今天，大学教授群体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体现在哪里？这些依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学术问题。

本研究源于笔者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兴趣，由于大学教授群体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精英部分，因此选择了中国近代（1895—1949）大学教授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教育史学的视角看，没有哪个历史时期的教授问题能够比中国近代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更能给高等教育界以无限的反思、联想与启迪。教育史学研究，不能不对此情有独钟。因此，本书选择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断层，以这一时期的大学教授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关探究。回望历史，近代是中国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新陈代谢的时代，也是中国大学教授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从知识分子群体中脱颖而出的时代。近百年以来，中国大学教授群体不断发展演变，其社会角色、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大学教授群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扮演着文化传承者的角色，但是，复杂的社会背景又使大学教授群体的角色发生着潜在的异化。早在 20 世纪，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就成功地剖析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学教授的某些“丑陋行迹”及其背后存在的问题，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异化的种种可能与现象。近年来，大学教授受到舆论媒体关注的焦点并不都是主流教授的“崇高化”、“完美化”的一面，更多的则是关注大学教授“妖魔化”的一面。这触动了笔者的文思，引发了这样的思考：当今的大学教授与历史上的大学教授真的有如此巨大的区别吗？过去的中国大学教授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具有怎样的历史基因？他们对社会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人们至今还如此怀念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困惑和期望得到解答的心理，无疑也是笔者选择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作为研究课题的一个直接动机。

由于本书研究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问题，所以在阐述“教授”等概念时，需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话语环境相联系，因此首先我们要界定几个相关的重要概念。

“教授”（professor），从词义学上看可以《辞海》或《教育词典》的释义为准。《辞海》认为教授是“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之一”，且是“高等学校教师的最高职务名称”。^①《教育词典》认为教授是“高校中取得最高学术等级的教师”。^②对中国近代来说，教授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大学令》中规定“教员设教授、助教授，必要时可聘讲师”，这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教授”名称来称呼大学教师。之后，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开始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这与当今中国的大学教师职称完全一致。因此，本书所称的“教授”是指经过一定组织机构资格认定而聘任的学术职业称号，泛指在大学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具有教授和副教授称谓或者相当于教授和副教授水平的教师。

“教授群体”涉及“群体”的概念，在生态学中，群体是指生活在同一生态环境中的由个体组成的个体群。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群体是指相对于个体的各种社会成员的聚合。在组织行为学中，群体是指在组织中由若干人组成的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所构成的人群集合体。^③组织、群体和个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群体介于组织和个人之间，个体是组成群体的细胞，群体是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大学是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的，教授作

① 《辞海》（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63页。

② *Dictionary of Education*（《教育辞典》），CARTER V. GOODMCGRAN—HIU Book company. INC, 1959.

③ 关培兰：《组织行为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19页。

为组织中的每个个体存在，教授群体是教授个体的集合，是大学组织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所称的“教授群体”，是指在大学中符合“教授”含义的高级学术人员组成的学术精英结合体。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他们具有大致相似的教育背景、经济地位、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这也是大学教授形成群体的基础。

中国近代的大学教授，泛指在中国被聘任为大学教授的全体学者，这里一般也包括外籍教授和不被称为教授的兼职讲师^①。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即使在人数最多的1947年也不过9000人左右，所以我们既不能把大学教授作为一个阶层看，更不能作为阶级看，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特别的知识分子群体。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属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大学教师研究范畴。通过检索近十几年来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涉及的多是对大学教师群体的研究，而对教师群体中的教授群体的单独研究并不多见，即使有少量专门针对教授群体的研究，也多是就某个方面的专题研究，而不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的系统研究。具体来说，目前国内外与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大类别：

第一，通过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大学教授群体问题。近年

① 1949年之前，教师都称为教员。这里的讲师不包括1927年之前的讲师，因为那时候的讲师并非水平低于教授的教员，而是指兼职教授。

来，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史采取了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不管是散篇论述，还是专著、丛书，乃至史料的选辑，都已堪称浩瀚。其中有关中国大学教育近代化和大学院校史研究更成为时下流行的研究领域。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的直接或间接的各种研究文献和大量研究成果中，必然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涉及对大学教授问题的关注或阐述。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对于本书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和大学教授群体形成的客观史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次，大学院校史研究打开了中国近代大学校史的尘封历史，许多著名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的大学校史资料和研究成果蜂拥面世，其中必然涉及对各自大学的教授群体资料的重现和整理。这些大学校史一手资料是本书研究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的直接依据和重要参照。

第二，通过对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群体研究来阐述教授群体问题。由于大学教授群体客观上属于大学教师群体的子系统，因此在大量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的研究中，对中国近代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过程、聘任机制、流动问题、结构特征、角色地位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必然有所涉及。目前，国内对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研究成果主要有：庞海江的《近代大学教师群体透析》、刘明的《论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员聘任》、邓小林的《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聘任之研究》、吴民祥的《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田正平等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